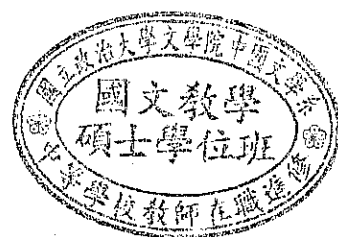


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觀察報告



史記國際學術研討會  
(觀察報告)

國文教學碩士班

年 級：

學號：

姓 名：

日期：2003.10.22

# 第一場：國際論壇：國際先秦兩漢學術研究概況（A）

時間：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09：20～10：30

會議主持人：王金凌先生

論文一：在美國看近幾年的《史記》研究

論文發表人：倪豪士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一）、論文摘要：

一、導言：

筆者今天將介紹兩本有份量的《史記》研究專著：其一是杜瀾德 Stephen Durrants 所著《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1995年由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伯尼分校出版，另一本是 Grant Hardy 哈代的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青銅與竹簡的世界》199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比起歐洲學者對《史記》的研究，這兩本著作比較願意從宏觀的角度去闡釋司馬遷與其巨著。

二、杜瀾德的《暈翳的鏡子》：

杜瀾德的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 225 頁的論文集，探討司馬遷對各種不同的歷史人物的認同，並討論《史記》中思想表達的方法。其中一個潛在的主題是：研討作家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其所刻劃的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因此採用了「鏡子」一詞。杜氏引用太史公自序裡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通古文。」龍門與長安正可被選作地理上的象徵，以指明繃緊而撕裂司馬遷作品架構的兩個極端。龍門是一個富於想像力和神話故事的牧場，長安是一個學習並且井然有序的場所。杜氏認為這樣的自傳性質的語句，反映出司馬遷在生活與作品中的根本性緊張。

杜瀾德還探討了數位司馬遷所記載的人物，以及他所蘊含的用心，例如：他認為司馬遷對伍子胥的故事加以改造，是為產生一種父與子的關係，進而去醫治他本身心頭的創痛。他也比較了《戰國策》和《史記》中關於聶政與他姊姊聶榮的敘述，並且評論到，司馬遷是把聶榮當作人生的楷模，認為他「在道德上更優於那些匆忙走向死亡的與無名的人」。此外對於劉邦與項羽的描寫，杜氏聲稱司馬遷在波瀾壯闊的敘事當中描繪出一個生動積極的項羽，接著將〈高祖本紀〉置於其後以使用文學技法突出對於高祖人物的靜態性。

本書的價值在於對《史記》作了令人映象深刻的文學性的分析。他於書末的結語談到：「司馬遷並非一個歷史哲學家，也不是一個道德家。而是一個文學天才，他寫的既是歷史又是故事。並且他所寫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已經融入個人自傳的歷史資料。」可以說杜瀾德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寬廣的背景。

三、哈代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

本書的主題思想是：司馬遷把《史記》創作成世界的縮影，而這一「模型」又體現了整個大千世界。當我們進入這個世界去瞭解歷史，更能夠自己去發現其中的意義。在第一章中哈代對於《史記》的五種體例以及它們之間的結構上的互相關係作了很好的學術性描述，並且對於「年表」的引用有獨到的見解，開拓了西方學術界的領域。第二章中哈代提到《史記》

中的不完整性及相互重疊的敘述是「作者有意為之」並用來為一個深思熟慮的史學目的服務。正如哈代所說：「一件事情在不同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意義以及人們在一次行動中常有多重意圖。」

哈代認為：「司馬遷要盡可能精確再現歷史，同時他要自己的作品有教育意義並強調道德訓誡。」也就是《史記》是一本教科書，通過它讀者可以學到怎樣讀歷史。因此在本書的前半，哈代檢討了《史記》的各種「文學加工」，特別是選擇、並列、重複、平行，對照，以及背景等。其所持的觀點，確有精彩之處。

在哈代的書中也強調了另一個概念，就是《史記》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孔子的形象總是縈繞在《史記》的字裡行間。而司馬遷也用《史記》展現了他對「歷史的征服」，也是本書的副標題。證明了文學與人格的生命力遠比政治力要長久。

總而言之，哈代認為：「司馬氏讓讀者全方位的感受歷史，……然而其敘事卻充滿含糊的事件轉變與多重視角。他請我們和他一起思考歷史，盡自己的努力去理解他。」而那些能夠從這本書中得到體悟並進而學會洞察歷史的人，才是史學的真正目的。

## (二)、心得感想：

本論文著重在介紹杜瀾德與哈代的兩本書，對於這兩本書解讀《史記》的觀點有詳細的剖析，然而對於這兩本書的特色，以及它們能不能夠反映出美國學者研究史記的觀點等不同層面的問題則是作者未加以論述的部分，讓讀者感到只有「點」的瞭解，未能有與「面」的關照，可能是本文稍有遺憾之處。

## 論文二：俄國人翻譯司馬遷史記二三事

論文發表人：劉克甫教授（台灣：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 (一)、論文摘要：

本文將介紹三位研究司馬遷史記的學者，來代表三個不同的時期的概況：

一、首先是畢丘林，他對俄國學術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反對盲目重複西歐漢學家的說法，提倡直接從原文史料中尋求有關中國歷史與現況的資訊。因為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詣很深，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有很廣泛的瞭解，1851年完成一部《古代中亞各族史綜觀》，是一部系統探討上古時代（N.Ya.Bichurin）中亞居民來龍去脈的書。其所包括年代自西漢至五代。而漢代西域各民族的情況，則據《史記》、《漢書》之記載以述之。本書所附「大宛列傳」，及俄羅斯出版司馬遷史記一部份譯文之最早者。

二、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有阿列克謝耶夫(V.M. Alekseev)，他對俄國漢學的重要貢獻，是中國文學、文化史、古文獻方面的研究。他在聖彼得堡大學講課時，開過「司馬遷研究」的課程，一方面閱讀列傳本文，一方面就司馬遷的人生觀、處理史料的方法、寫作特色等加以詳細的分析解說。因為他對於古文的深入理解，且文學修養超人，翻譯技巧又有其獨特的風格，所以他在課堂上所講授，篇篇都是佳作，普遍受到極高的評價，被認為是翻譯中國古代文獻之標準。

三、五十年代的越特金(R.V.Vyatkin)他有意將全部《史記》譯成俄文，而實際上完

成了〈本紀〉的翻譯，越氏的史記譯文有幾個特色：1、重點不在文筆優美，而在原意表達正確無誤。2、廣泛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凡是歷年有《史記》翻譯或分析司馬光史學之主要著作，幾乎無一被遺漏。3、治學態度非常認真嚴謹，原文可疑或各家有意見分歧之處，皆一一註明，並詳述己見之所以能夠成立的理由。甚為可惜的是越教授的翻譯至今尚未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 （二）、心得感想：

本論文以時代為綱，以人物為緯，對於三位俄國研究《史記》的學者其治學方法與研究特色，都有著提綱挈領的介紹，讓讀者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掌握了俄國對於《史記》研究的大概情況，如果劉教授能夠將這三位學者的作品，在本論文中舉例引用幾個片段，讓讀者稍作欣賞閱讀一番當更具體而清楚。

## 論文三：日本的《史記》研究

論文發表人：連清吉教授（日本：長崎大學）

### （一）、論文摘要：

#### 一、《史記》的傳入：

相當於中國的唐代的時候，日本已有《史記》的流傳，平安時代（AD794-1184）流傳的《史記》大抵是鈔本，影響層面較小，到了鎌倉時代（AD1185-1333）、室町時代（AD1333-1573），不但中國的《史記》刊本傳入日本，抄寫評注也流行一時，故流傳的層面擴大，而江戶時代（AD1603-1867）、明治時代（AD1868-1911）由於和刻本《史記》的刊行，普及的可能性更大，故能進行《史記》的校訂、考證、注釋等研究。

#### 二、《史記》研究的變遷：

在江戶時代的《史記》注釋、考證的著述中，最值得注目的是中井履軒（AD1732-1817）的《史記彫題》。其著述觀點有論述先人注釋之當否，校訂字句，考證年代、制度、曆法，疏通文意，品評人物等，頗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所參採。

#### 四、日本近代的《史記》研究

1. 《史記》的注釋、考證——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開啓了日本近代《史記》的研究，其特色則有考校諸本以為《史記》之善本，究明《史記》史料的來源，三次補訂而成書，集古今內外《史記》注釋之大成等四點。
2. 研究目錄的整理——主要有池田次郎注，池田英雄校訂增補的《史記研究書目提解稿本》（明德出版社，1979年）、藤田勝久《史記、漢書、研究文獻目錄（日本編）》等。
3. 司馬遷研究——日本於司馬遷生存的時代背景、著述《史記》的用心、《史記》的體例特色、人物描寫，《史記》對世上史書、文學創作的影響，《史記》版本研究等方面，有為數甚多的研究成果。例如：佐藤武敏的《司馬遷的研究》一書分司馬遷的家譜、司馬談與歷史、司馬遷的生平、遊歷、仕宦、李陵之禍，《史記》的成書經過、《史記》書名訂定的原委、體例內容的特色及其在目錄學上的地位等章節，對司馬遷與《史記》

都有詳細的研究。

4. 從史學的觀點評論司馬遷及《史記》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以一群京都學者為主，而京都中國學的學問是以科學實證為學問方法的經史文化之學。例如：內藤湖南以為《史記》的記述不但有反映時代社會的現象，也有探究歷史變遷的論述，如〈游俠列傳〉與〈貨殖列傳〉的敘述即是。就內藤湖南、貝塚茂樹、宮崎市定詩第三人，於《史記》的研究，可以看出文獻考證以辨章學術，考竟源流而通古今之變是京都史學研究的特質。
5. 利用經典文獻與新出土物而從事新的研究——其中有顯著成果的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平勢隆郎與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藤田勝久的研究。平勢隆郎的研究著力於年表的研究，並傾注心力於經典文獻的與出土文物的考察，著作《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的研究序章》分析《史記》載記年代錯誤之所在，修正《史記》於夏商周三代以迄春秋戰國年表的誤謬。藤田勝久則以為與《史記》文字考證、列傳人物評價有密切關連的戰國史料的研究是歷來所缺的，乃繼承了王國維的雙重證明法，著作了《史記戰國史料的研究》，分析論司馬遷取捨戰國史料的內容及其正確性與否，究明《史記》於戰國七國史料之編纂過程與撰述方法。

## (二)、心得感想：

由本篇論文可知，日本的《史記》研究比較偏向於基本資料與背景資料的考證工作，著重科學與證據的研究態度十分踏實與縝密，此點和美國的學者喜歡用歷史哲學的角度去大膽解讀史記的研究偏向，的確有所不同，而這兩種研究態度都有值得取法與值得借鏡之處。

## (三)、第一場現場討論：

1. 請問劉教授：越特金先生是否已經翻譯完全部的《史記》？並且他是參照哪些材料來作翻譯的？文中有用到普希金小說的說法是嗎？

劉教授回答：是的，越教授已經將《史記》的全本都翻譯完成了，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來不及出版所有的翻譯著作，還有一冊列傳的部分尚未出版，目前俄國東方研究所存有底稿，正準備為他出版。至於他所參照的資料非常豐富而廣泛，他蒐集了當代各國最重要的《史記》相關研究著作，他把這些研究成果融入翻譯之中，對於深入的瞭解《史記》以及其各家各派的不同說法，都有莫大的助益。而他的翻譯中的確是有用到普希金小說中的說法，這也是二十世紀以來，很新的一種作法與研究方向。

2. 請問倪教授：當您在翻譯《史記》的工作過程中，如何克服兩國文化差異的問題，以及您又遇到哪些難題？

倪教授回答：我們採用一個團體討論的方式來翻譯《史記》，結合大陸、台灣以及美國的學者、研究生，經過共同討論得到的結果，相信是比較周延的作法，況且中國人自己去讀《史記》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與歧見，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我們也有不瞭解的地方，但是經過大家

共同的努力與討論，取得了較為令人所接受的想法。至於翻譯中比較困難的地方很多，例如：五行的觀念，我們就不容易懂，也不好翻譯，其它也有許多字眼沒有相對應的英文可以翻譯，例如：「弒」字在英文中殺就是殺，沒有分成是下對上或上對下，因此我們必須用注釋的方式來翻譯。

## 第二場：國際論壇：國際先秦兩漢學術研究概況（B）

時間：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10：50~12：10

會議主持人：王金凌先生

論文一：盛乎？衰乎？——略談韓國中文系的古典教育

論文發表人：李康範教授（韓國：中央大學）

### （一）、論文摘要：

韓國創辦中文系始於 1970 年代中期，自此之後中文系慢慢的增加，但是我進入中文系的 1976 年，100 多所大學之中只有 7 個中文系，過了二十五年的今天，韓國擁有一百多個中文系，同時碩博士班也增加到二十多所，於數量上可謂蓬勃發展，但是也潛伏了不少的隱憂。七十年代的中文系課程中，古典科目佔了三分之一，如文字學、諸子選讀、經書講讀等經史子集各方面都有課程。至於中國話的課程則一學期修一兩門就夠了。對說與聽的能力要求並不高。但隨著時代的轉移，近年來由於與中國交流增加，中文系學生要求增開中文話的課程，社會需要懂得現代中國話的人才，因此也為此刪除了許多的古典科目。至於中國話的課程則開得越來越多舉凡：初級、中級、高級中國話以外還有時事中國話、貿易中國語、觀光中國語、甚至有武俠中國語等。使得原先的古典教育被「實用教育」所排擠了。同時對於現代文學的需求也越來越多，遂形成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語言學、三分天下的局面。如今研究所中選先秦兩漢為自己研究專業的研究生，每年都大大的減少，可以說已經失去平衡，更令人擔心的是，研究生的閱讀古文的能力已經大不如前。

當然這二十年來，在現代文學和語言學上得到空前的發展，也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如果年輕一代的學生能夠將古典研究與其它領域結合起來，二者沒有偏廢，將可能會有更上一層的成果。

此外近年來，在民間自行組織社團共閱經書，有老師指導而學習中國古代典籍的情形也很多，如「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芝谷書堂」等機構的閱讀經書班是較有名的。參與其中的學員必須將整本的經書如《左傳》、《史記》等整部背下來，相對於這些私人機構的積極努力，大學的六經教育似乎有許多檢討的必要。

### （二）、心得感想：

李教授用極為生動幽默的語言概述了韓國境內中文教育的轉變與現況，對於目前韓國中文教育界所流行的「實用觀念」，他提出了語重心長的呼籲，其實不僅僅是韓國的中文教育是如此，由台灣目前在中文系所開的課程來看，其實也有日漸趨向淺白而忽略古典經書的傾向，然而這些古籍其實是孕育文學生命的源頭活水，如果中文系的學生對它們已經日漸生

疏，甚至不能讀懂它們，那麼想要提昇中國文學的理想無異是緣木求魚了。

## 論文二：大陸《史記》研究現況概述

論文發表人：陳桐生教授（中國：汕頭大學）

### （一）、論文摘要：

近二十年來大陸《史記》研究呈現繁榮的局面，本文將從幾個方面介紹其現況。

#### 一、研究領域的開拓：

近二十年來，由於西方學術思潮的湧入，拓展了大陸學者的視野，促史學者們用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史記》，從哲學、美學、歷史……到天文學、教育學、醫學、農學等領域的研究都有。揭示出《史記》作為中華民族百科全書的特殊價值。其中由陝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馬遷與華夏文化叢書」（1999年出版），以二十八種的鴻篇巨制，對《史記》與華夏文化的關係作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地毯式的研究。（1）、自覺進行世紀學術總結分為兩層次：其一是總結二十世紀的中外《史記》研究，主要是出版了一批總結性的論文；其二是對於近兩千年的《史記》研究予以總結，為此大陸學者組織了兩項大工程：一是由張大可教授主持的《歷代名家評注史記集說》，該書將此前兩千年研究《史記》的觀點集為一書，這部二百多萬字大著目前已經殺青付梓；二是陝西省司馬遷學會組織編寫的《史記研究集成》，該書的志向是集校刊、注釋、評點之大成，成為繼《史記》三家注、《史記會注考證》之後的第三個里程碑。目前該書已經完成十二本紀部分的撰寫，到二十一世紀全書完稿之日，將有二千至三千萬字。

#### 二、注重利用地下出土文物：

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陸相繼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學者運用了這些文獻研究《史記》，得到了許多新的發現。例如：1972年山東銀雀山出土了二百多字的《唐革賦》殘簡，經過羅福頤等人的研究，認為「唐革」就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的「唐勒」。而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學者們由此證實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載的真實性。其它如長沙馬王堆、湖北荊門楚墓等出土的資料對於《史記》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幫助。

#### 三、注重《史記》藝術研究：

九十年代起《史記》藝術研究形成了多角度的研究格局。例如：韓兆琦從審美角度探討《史記》藝術，他認為司馬遷審美觀的獨特表現在分外喜愛悲劇英雄；劉振東以為，司馬遷在材料的選擇上特別注意特異性的事跡和情節，在敘事中特別注意情節的組織安排，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增強內容的特異色彩。

#### 四、研究方法多樣化：

八十年代學者清一色使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史記》。近二十年來大陸《史記》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創新，比較方法使用最多。如：黃新業、劉清河等分別將司馬遷與古希臘史學家西羅多德《歷史》、《舊約》等西方典籍進行比較。此外胡大雷、徐興海等人嘗試運用系統論研究《史記》結構；齊效斌運用符號學原理對《史記》稱述人稱、敘述風格、敘述空間和時間進行研究。

#### 五、成立《史記》研究組織：



1992年陝西省成立了司馬遷學會，組織了一系列的《史記》學術活動。其不足之處是有的文章停留在羅列現象，有的文章脫離當時語境而按現代人思想來講司馬遷……大抵在考據、校刊、版本方面的研究較為薄弱。

## (二)、心得感想：

經由陳教授的介紹，讓我們瞭解大陸對於《史記》的研究所呈現的蓬勃發展的景況，其中幾部集合眾人之力而完成的作品更是為研究《史記》的學者開啓了一個全方位的視野，相信對於史記的研究有著相當大的貢獻，也由此可見大陸的學者這種團結眾人之力來完成大部頭著作的研究成果，的確令人稱羨不已。

### 論文三：台灣近四十年《史記》研究概況

論文發表人：齊曉楓教授（台灣：輔仁大學）

#### (一)、論文摘要：

##### 一、博碩士論文以《史記》為研究者：

以《史記》作為博碩士論文研究的，自民55年至民88年，約有幾方面：

- 1.針對《史記》篇章進行疏證的，如何錡章的《史記楚世家疏證》，劉本棟《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疏證》等。
- 2.就語法、修辭、或寫作技巧探討者，如許璧《史記稱代詞與虛詞研究》，曾志雄《史記語法研究：變換律語法初探》等。
- 3.探討《史記》褒貶義法的：如郭瓊瑜《史記的褒貶義法》，金苑《史記列傳義法研究》等，而呂世浩的《從五體末篇看《史記》的特質——以平準、三王、今上三篇為主》則研究《史記》五體末篇的深意，作者認為其末篇無一不含譏刺之意，皆暗寓「賤利讓爭」「以讓化爭」之義。也可見《史記》一書之特質為「論治之書，百王大法」。
- 4.研究《史記》引用古籍材料的方法及其與原著之間的關係影響的：有古國順《司馬遷尚書學》、張添丁《司馬遷春秋學》等。
- 5.由史學方法、歷史思想、文學價值與文學觀方面探討的：有台大阮芝生教授的《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文中認為應該把《史記》放在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發展中去考察，所得到的結論是：《史記》是以述為作，具創造力並且已經超出史學和文學的範疇，而達到哲學的境界。此外金利湜《司馬遷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柳貞愛《司馬遷浪漫意識的文學觀》等則是從文學的角度觀察《史記》。
- 6.由地理的角度研究《史記》的有：林哲生由區域經濟的現象、水資源的管理、全國總體經濟政策等方面論述，主要再找出《史記》中所隱含的司馬遷地理思想與觀念。

## 二、期刊論文舉隅：

期刊論文中研究《史記》大約有幾方面：

1.以《史記》中的女性為研究對象：李毓善的〈《史記》中的女性〉文中歸納分析「母親」與「妻子」兩類身份，認為「凡有母親出現的場景，往往是史文中最生動的一段人生，歷史發展之轉捩點。」以及瞭解《史記》中有關婚姻禮俗、夫婦關係的型態。

2.引進西方文學理論來解讀《史記》的有：呂正惠的〈叔孫通列傳〉和〈魏其武安侯列傳〉兩篇傳記為例，以盧卡奇的寫實主義理論分析司馬遷的《史記》。認為司馬遷是寫實主義的偉大人才，他能掌握人物的「典型」，並透過他反映了社會的「整體性」。此外柯慶明的〈論項羽本記的悲劇精神〉一文，企圖由生命意識的呈現與昇華，檢視《史記》文學活動的意義，從作者、讀者與作品三方面，探索其創作、結構與欣賞三種心靈活動的交互作用。

### (二)、心得感想：

齊教授從博碩士論文以及期刊論文的研究成果來介紹台灣的《史記》研究成果，所蒐集的資料詳細而有條理，能夠看見台灣近四十年來研究《史記》的角度與成果，然而文中所舉例之篇章繁多，所切入的角度也有很大的差異，如果能夠加上作者自己的評論與見解，能夠在這些篇章之中進一步找出近四十年來台灣學者研究《史記》的特色與新的觀點，以及哪些類型的研究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等等，如此將更能夠深入瞭解台灣學者對於史記研究的精神與內涵。

### (三)、第二場現場討論：

1. 徐州師範張先生：用現代的史學方法來分析古代的文本，這樣的方法也適用於其他的古典文本。此外台灣有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去研究《史記》的，也想請問大陸有沒有類似的研究？

陳桐生教授答：有的，但是比較少，例如浙江師範大學有《史記》語言研究所的成立，但尚未有專著的出現。

2. 請問台灣《史記》的教學與普及情形如何？

齊曉楓教授答：本校將《史記》當作重點教學科目，要求學生要點書等，但是其他的學校就不一定是必修課，有時候變成選修。至於普及在出版界的也多是如《史記的處世哲學》等應用類的書籍，目的是希望它在市場上成為社會上人人看得懂且由其中得到一些智慧的書。當然若能夠在各大學大一國文中普遍的教《史記》的課程。並且《史記》的典籍在印刷時要注意市場的接受度與本身的學術品質，當然更好。

3.東吳大學林先生：《史記》在《漢書·藝文志》中視之為《春秋》一類，可說它是承《春秋》而來的，如今大家喜歡它的文章精彩，幾乎已經忘了他原本的意義。其實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言，本書是提供聖人君子讀的，而非一般大眾茶餘飯後的助談書籍。例如〈項羽本記〉在記載項羽失敗與興亡之關鍵的過程中，已經透露了「究天人之際」的意涵。因此不宜只從文學的角度看它，會失去其真正的意義。

王金凌教授答：不同的時代，人們自己可以看到不同的一面。也正可以顯現《史記》的豐富內涵。

陳桐生教授答：我贊成您的看法，《史記》可說有兩大學術淵源：經學與諸子學，而諸子學的部分正是有指導帝王政治的功能。有類《春秋》正如國家的憲法一般。而在《史記》中也可以看到，在戰國秦漢之際，中華文化定型的過程。

### 第三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八日星期六 13:30~15:10)

會議主持人：簡宗梧先生

論文一：《史記》敘戰之義法——兼談與《左傳》敘戰之關係

論文發表人：張高評先生

特約討論人：夏長樸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史記》與《左傳》，並稱為中國史傳文學之鼻祖，同為敘事藝術之雙璧。清·方苞倡導古文義法，亦標榜《左傳》《史記》二書，作為桐城義法之典範。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篇》曾較論二書之風格，以為「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可見《史記》與《左傳》二書在性質、風格、義法、典範方面，有諸多可資研究之選題，非獨比較春秋史事之因革損益而已。歷代文論家論文類寫作，多以敘事為最難。《左傳》於敘事藝術，卻能因難見巧，贏得劉知幾《史通》之高度贊美。敘事之中，《左傳》尤長於敘戰，敘戰中尤工於敘謀，所謂「千古文章而兼兵法者，惟《左傳》，與「兵法而兼文章」之《孫子兵法》，堪稱雙絕。司馬遷編纂《史記》，家學、太史、學養，皆與兵家淵源深遠，即《史記》敘事傳人，談謀用兵，亦多娓娓可觀。以論者之見，《史》、《左》之敘戰，焦點皆側重「述存亡之跡，稽興廢之理」，其要旨歸於懲善勸惡，經世資鑑，其中有史家嚴肅之使命在。《左》《史》敘戰，如何體現「述存亡之跡，稽興廢之理」，史觀，此則有賴對史料之剪裁取捨、筆削見義。《春秋》書法所謂諱言諱書、書、不書、微、婉、顯、晦、史法義法所謂詳略、損益、互見、偏載、虛實、前後諸端，善加運用皆可見筆削之大義與微言。《左》《史》敘戰，為體現經世資鑑之史觀，對於影響或決定戰爭勝負，將帥成敗之因素，多津津樂道之，尤其兵法謀略之高下，將帥個性之特質，《左》《史》敘戰，多所強調。多敘謀、寫勢，而略寫戰況，此《左傳》敘戰之特色；秦漢以降，唯太史公《史記》得此薪傳，而司馬光《資治通鑑》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亦略得《左》《史》詳敘謀，略敘事之三昧。

(二)、現場討論：

- 1.文題有「談《史記》與《左傳》敘戰之關係」等字，但從文中看來對二者「敘戰」之「關係」與「傳承」的討論卻付之闕如。
- 2.文中所引方苞意見之處過多，似有喧賓奪主之嫌。

(三)、心得感想：

張老師對《左傳》一書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故本文中對於《左傳》敘事多有精闢的論述；但相形之下，討論《史記》部分則比重略顯太少，實有夏老師所論之憾。

論文二：從《史記》誌韓非談太史公之紀實與浪漫

論文發表人：王初慶先生

特約討論人：李增先生

(一)、論文摘要：

《史記》一書，自揚雄以降許為「實錄」；然太史公逞其才，往往將其情感融入史傳之中。本論文僅以其書記韓非之資料為據，一窺其誌人在紀實與浪漫間之拿捏。論文以韓非本傳為主，輔以全書涉及韓非之相關資料，分為四個方面論述：一、誌韓非之生平。二、誌其學術大要、師承及論著。三、敘其入秦之緣由及下場。四、太史公與韓非之評價。論者以為：太史公之敘史，已將自己全部生命、感情寄託溶入史傳之中。既為史傳，自不得不有「紀實」之部分；韓非之著作、其人在韓、在秦之行，史遷皆能有條理分明之敘述，加之以本紀、年表、世家各體互見，稱之為「實錄」亦為允當。然偶有以其豐富之想像力為傳主之生平補白，往往更將其不遇之情懷，投射到所寫傳主之上，充沛之同情心，跳躍於字裡行間，即使在二千年之後，吾人亦仍深受到這分情感的悸動。不是「浪漫」的情懷又何能致之？然則論者強調，太史公之史才，並不以一己之情感愛憎而影響史傳之公論，終發「太史公曰」指「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為總結，亦不亦宜乎？而史遷在其作品中「紀實」與「浪漫」的生動筆觸，長久以來，並行不悖，都受到後人之讚歎與激賞。

(二)、現場討論：

杜維運嘗謂「歷史的想像」一詞，即說明了史家在事件表象之外，予以合理的解釋與聯綴。太史公善用其法，致使人物聲口畢肖，在紀實與浪漫間取得了極佳的統攝協調。

(三)、心得感想：

史家以其人生之閱歷，因其性格的殊異，對於同樣的事件表徵也許會有不同的闡釋。司馬遷《史記》最動人之處，我想絕大部分與其性格浪漫有很大的關係吧。

論文三：《史記》V.S.當代文化產物——從《史記》的三種譯本談起

論文發表人：康士林先生（謝惠英譯）

特約討論人：鮑端磊先生

(一)、論文摘要：

本論文提及三個不同的《史記》英譯本所具有的文化意義。Watson 的譯本帶頭出現，主因為哥倫比亞大學。由於 Watson 的個人天分、DeBary 的識人之明、哥大出版社的財力雄厚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同時齊備，使得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在有關中國的教學和學術圈出現了這個深受歡迎的譯本。Watson 的《史記》英譯本為美國讀者做了些改變。他選列和重編《史記》的某些篇章，為西方讀者呈現一部較流暢易讀的漢朝歷史。楊氏夫婦的譯本出版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晚期。這個譯本對美國的影響較小。原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較不允許北京外語出版社的出版物在美國流布。Nienhauser 的譯本是《史記》學術研究的濫觴。西方學界中，有許多漢學家因為擇定了重要的中文作品進行學術翻譯，由於成績斐然而享有學術聲望。在西方文化中，既存的拉丁、希臘古籍和《聖經》的學術譯本賦予了這些文本活躍於當代的基礎。因此，這些中國古籍的學術譯本也將奠下中國文化存在於西方傳統的起點。

(二)、現場討論：

好的文字能力和負責任的態度決定了一個譯本的好壞。Nienhauser 的譯本異於 Watson 和 Yangs 的兩個早期的版本，在文字的流暢與優美上，更忠實地貼近《史記》的原貌。無疑地，這個譯本將對介紹中國典籍到西方世界有重大的貢獻。

(三)、心得感想：

本文並不具論文的格式，較像是介紹性質的文字。但也因而讓與會的人士知道，《史記》的譯介工作有這樣的沿革過程，同時也佩服 Nienhauser 教授的翻譯團隊堅持這浩大的工程。

## 第四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八日星期六 15：30~17：40)

會議主持人：李威熊先生

論文一：《史記》中所表現的死亡觀試探

論文發表人：孫映達先生

特約討論人：高柏園先生

(一)、論文摘要：

司馬遷對於生死本質的認識，是出於一種樸素的務實的態度。《史記》中沒有涉及形而上的哲理思維對於死的玄想。《史記》寫死亡，實際上是寫死亡背景中的人生，其中所表現的死亡觀大體上是一種人生觀的折射，由此角度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內涵是重倫理、重道義、重視人生事業、重視人格尊嚴的，是儒家文化的充分體現。本論文分為四部分展開論述：一、對於死亡的生命哲學含義之認識。二、死亡的意義與人生價值之關係。三、面對死亡的態度。四、結語。

(二)、現場討論：

- 1.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可資爲用，但本論文卻付之闕如。
- 2.作者在文中所舉的例子並不能明顯地支持其論點，故推論的方法很重要。
- 3.文中「范雎」是否爲「范雎」的誤植？然作者發表時均讀爲ムメ？

(三)、心得感想：

本文以大陸常用的「唯物史觀」的觀點來推論，極易有偏頗不周之弊。本文之中殊多推論有令人難以信服之處。

論文二：激進乎？保守乎？《史記》中刺客與游俠的價值觀

發表人：林聰舜先生

特約討論人：劉漢初先生

(一)、論文摘要：

《史記》中的刺客與游俠是很特殊的人物類型，史公寫出他們的激烈性格，歷來評者也傾向於把他視爲體制的破壞者。然而，刺客與游俠雖有激進、破壞體制的一面，他們的價值觀卻相當複雜，甚至有時與統治階級共享一套價值體系，亦即他們的價值觀也具有很強的保守性，而此一特殊面向，一直被忽視。本論文先標示游俠與刺客的類似性，藉以說明二者合論的理由。次則說明刺客與游俠激進的反體制性格，將刺客與游俠的異端性與游離性呈現出來，並特別說明游俠在統治秩序外，呈現「另一種」道德，觸及道德具有階級性的高度。再次則說明一般人眼中激進、破壞體制的刺客與游俠，仍有很強的保守性格，例如豫讓堅持「忠」的理念，聶政重視「孝友」，郭解則師法儒家的「以德服人」，塑造個人形象。此一面向是歷來學者所忽略的。最後爲結語，並對激進的游俠與刺客何以仍表現保守的價值觀提出解釋：其原因可能是強大的文化傳統有關的強大的體制力量的影響。

(二)、現場討論：

- 1.「主流價值」一語在文中意指模糊，應予以界定。
- 2.不在此二傳中的人物，《史記》中仍多有，也可並入討論。如〈魏公子列傳〉中之侯嬴。
- 3.是否當時社會有「中國式武士道」精神存在？
- 4.可思考刺客與游俠和今日幫派之關係。

(三)、心得感想：

〈刺客列傳〉與〈游俠列傳〉向來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咸認爲司馬遷作此二傳乃讓千古後讀者讀之而呼之大快。也連帶影響了後世武俠小說中塑造重義氣的俠客形象。

論文三：讀《史記·酷吏列傳》論漢武帝與酷吏

論文發表人：徐漢昌先生

特約討論人：李偉泰先生

(一)、論文摘要：

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疆拓土，後人稱羨。但在當時，因久戰不休，加之天災頻仍，導致民生困苦，社會動盪。朝廷為籌措財源，推行多項新財經措施，影響民生也極大。為貫徹政令，那些認真執法，不畏權貴、豪族的官吏，自然為朝廷所嘉。這些人以性情刻深、善伺上意而得勢，並蒙君王許以為能。其中任執法工作者，競以嚴酷為尚；有制法之權者，奉承上旨，訂苛察吏民之法；司馬遷一概以酷吏稱之。上無良法，下有酷吏，而皆為君王所樂用。實則制法的酷吏，為禍天下甚於執法的酷吏，宜分別評價。至於重用這些人的漢武帝，其過失亦極顯然。治國必用法，賞罰亦必依法而行。人人喜賞而畏罰，韓非說：「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賞罰交互為用，乃能得人。漢武帝時，厚賞蠻夷降卒而重罰中國百姓；厚賞貴戚愛將而嚴誅異己大臣。君心如此，宜乎酷吏輩出，競以嚴殺為事。究其實，有漢武始有酷吏。故〈酷吏列傳〉與〈平準書〉二文，譏評酷吏，而漢武之過亦於是乎見。

## （二）、現場討論：

1. 剪裁取捨得當，一針見血道出制法者、執法者與在上位者三者利益關係。
2. 作者對儒、法二家有精深的研究，能以法家論點來說明，更具說服力。
3. 文章雖求用詞精簡，然部分仍須在文中或註解中略加說明。

## （三）、心得感想：

徐教授本文論述十分井然，推論縝密，用字精煉簡要；尤其對漢代社會背景更有相當研究成果與心得，實為我輩寫作論文時學習參考的典範。

## 論文四：《史記·天官書》的天象占候及其禮治思想

論文發表人：鐘宗漢先生

特約討論人：莊雅州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史記·天官書》是中國天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在此前後，僅甘公《天文星占》八卷與石申《天文》八卷合編的《甘石星經》的殘篇輯文，以及《淮南子·天文訓》的少數紀錄。《史記·天官書》在中國天文學史上的貢獻，在劉朝陽先生、高平子先生的許多專著中，已有相當詳實的評論。本論文主要是由〈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的理念，以《史記》「八書」皆「禮書」的認知作為思考主軸，對於〈天官書〉記載天象變化的方式與占候分野的舉證，進行思想性、結構性的連貫，藉以突顯出《史記》「究天人之際」的特質以及〈天官書〉所蘊含的禮治思想。司馬遷是在天象占候的外衣下，裹藏著對於漢帝國大一統局面的理想與願景，也暗示著對於漢武帝迷信求仙、窮兵黷武所可能帶來的結果的擔憂與勸諫。而〈天官書〉的禮治思想雖然只是隱隱若現，然司馬遷的史家用心，仍是深刻而呼之欲出的。

### （二）、現場討論：

1. 本文結構缺乏一般論文的「引論」及「結論」結構。
2. 第六十四頁第十行，對於「天官」二字是否有更好的詮釋？
3. 第六十五頁，牽牛、織女並不在二十八宿之中。
4. 六十五頁提及《淮南子·天文訓》，實應為〈天文篇〉才是。「訓」乃高誘所做的注。

### (三)、心得感想：

向來《史記》所為人所矚目的焦點多集中於本紀、列傳部分，鮮少有人探及八書。因此本文作者對於天官書的研究誠為可貴。惟天官書涉及天文星宿，並不容易入手，所以也難引起在場較多的共鳴。

## 第五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09:00~10:20)

會議主持人：傅錫壬先生

論文一：日本京都中國學派的《史記》評論

論文發表人：連清吉先生

特約討論人：張寶三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前言：

京都中國學派的學問特色，一般以為京都的中國是以清朝考據學為基底的科學實證之學，內藤湖南則是遠紹清朝的學問宗尚，以史學的角度綜觀中國的學術發展其實京都學派的學問性格，特別是內藤湖南的學問不純然只是考證而已；乃是在目錄學的基礎上進行旁徵博引、精詳考證，而建立通貫宏觀的歷史識見。又由於京都自古即是日本文化之所在，而且有與江戶中期以來考證學風的傳承，在此學術環境下，故京都中國學的學問可以說是以科學實證為學問方法的經史文化之學。

### (一)內藤湖南的《史記》詮釋：

內藤湖南以為《史記》是綜括統一之時代的產物，《史記》不僅是帝王政治參考類書，更有繼承孔子寄寓微言大義於《春秋》與董仲舒《春秋繁露》維繫道統的用心，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著述。內藤湖南以為《史記》行文極具巧思，又頗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現象，如〈游俠列傳〉與〈貨殖列傳〉的記述即是。前者是在記述政府的制度所未及之處，民間以某種形式或力量取而代之，以施行社會的制裁。後者則在描寫政府的取締無法徹底的執行，導致個人得以發揮自身的力量，而形成貧富懸殊的現象。又由於時代的差異，史書的敘述觀點也有所不同。內藤湖南舉游俠形成的背景，來說明《史記》與《漢書》著眼的不同所在，《史記·游俠列傳》旨在說明在司馬遷的時代，由於社會不平等的結果終於出現執行社會制裁而發揮個人力量的游俠。但是到了宣帝的時代，政令嚴肅，發揮個人力量以遂行社會制裁的游俠卻形成政治的妨害。司馬遷之所以如此立論，是因為其採取時代變遷的敘述觀點，因為春秋到漢初，是以個人能力而自由競爭的時代，欲辨明此一時代的社會現象，則不



能不著墨於縱橫天下之英雄豪傑的活動，再者，時代既有變遷，則制度的施行亦不能不因革損益，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的意義即在於此，內藤湖南以爲一家之言的著述是《史記》的特徵。

### （二）貝塚茂樹的《史記》詮釋：

以舊西洋史學的敘述方法而言，《史記》的〈本紀〉〈世家〉是政治史，〈表〉〈書〉是文化史，〈列傳〉是傳記。有近代西洋史學之祖的德國史學家 Leopold von Ranke 主張直接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才是正確的史料，至於歷史的研究也非以此種歷史記述爲對象而進行考察不可。以此學說考察《史記》的敘述觀點即可理解司馬遷的撰述是合乎近代西洋史學學風的。貝塚茂樹以爲司馬遷以「六藝」爲古典的基準，取捨當時爲數甚多的歷史文獻，採取最可信的載記而編纂《史記》，此一歷史記述的方法即是近代西洋史學的方法。不但紀錄王朝及其時代的歷史，更超越王朝的制約，清楚地記載制度史、經濟史、技術史、風俗史於時代變遷的過程。《史記》的〈列傳〉於中國史書的價值，司馬遷之著眼於歷史人物的行動與個性的描寫是前有所承的，貝塚茂樹以爲發揮個性的自覺，是經過戰國至秦漢而到達頂點，此一文化的時代背景是司馬遷編纂紀傳體之《史記》的遠因。貝塚茂樹說：撰述〈列傳〉，企圖於歷史的記述中再現逐漸喪失的「個性自覺」。再者，「傳」原本是以師弟問答的形式而口述相傳經典之義，《史記》的〈列傳〉則是記載文獻或口傳接聞之歷史或時人的生涯。在記述形式上，由口耳相傳經典內容的「傳」轉爲記述個人行動的「傳記」，則是司馬遷獨創的歷史記述方法。貝塚茂樹以爲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的提高，此一觀念意識的形成，乃起因於《史記》的〈列傳〉。就此意義而言，司馬遷以人物爲本位而編纂歷史，進而構築的歷史意識，深深地支配了中國人的生存價值。

### （三）宮崎市定的《史記》詮釋：

宮崎市定以爲研究《史記》的著眼點有二，一爲解讀《史記》本文難解之處，發現史學研究的新方法，一爲以文獻學觀點，探索《史記》取捨史料的根源所在。考證漢代貨物的價格，記載漢代物價的史料有三，其一爲散見漢代諸書的斷片，其二爲近代出土的漢簡，其三爲《史記·貨殖列傳》。根據〈貨殖列傳〉的記載，宮崎市定以爲司馬遷有每年獲利二萬文的設定。至於馬牛羊豚的價錢爲何，宮崎市定參照《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食貨志》的注釋而列出馬牛豚的價格，買賣在購求利潤但是就所顯示歷來注釋的結果，馬牛的成本單價較販賣單價少。若以二成利潤爲原則，則馬的買賣完全沒有利益。因此，《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食貨志》的注解就不能不有疑問了，在不改字解經，而詳密考證以爲新解的原則下，宮崎市定從動物學的觀點，說明馬爲單蹄，故於馬的解釋可如舊注；牛爲雙蹄，四肢八蹄核二角，其數則爲十。至於「足」的解釋，則引證《說文》、《漢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等書以爲畜獸的後肢稱「足」或「股」，前肢則爲「肩」，故「牛千足」及後肢千隻，五百頭。以此考察〈貨殖列傳〉的文字，則可得到結果，雖然如此，成本單價爲販賣單價的四、五倍，顯然理解上有所誤差。至於探究社會變遷，宮崎市定說：所謂「游俠」是無特定的主人，應聘而往，以服犬馬之勞的劍客，日本的「野武士」、西洋的 free lance 是相同的存在，雖然如此，通過游俠的興起，流行而至衰滅，卻可以考察春秋戰國而至秦漢社會變遷的跡象。爲防衛祖國而持武器戰鬥士族生存的原則。只是春秋初期尚有上下的主從關係，還未有懷劍求鬻而遊走天下的「遊士」的出現。春秋末期到戰國由於諸侯貴族致力於常備軍的

設置，終形成士無定主而任選其主的風尚。重視義氣而有恢宏的氣度，則是招集天下賓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因此，在以義與利而結合的團體中，自然也產生「救人之厄」、「重然諾」的道義精神，而此道義精神中成為游俠社交界的規律。「有士卿相」的俠義氣度為後世之閭里鄉曲的俠所繼承，終形成游俠的黃金時代。至於象徵著獨立不羈之氣概的游俠，完全自世間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游俠的貴族化。推察《史記》史料記載的源流本末，與解讀《史記》本文同為研究《史記》重要之所在的是《史記》史料來源的探究。《史記》根據閣藏書、王室記錄、先秦諸子的書籍與民間傳說而編纂歷史，是眾所周知的事，然而其所根據的民間傳說的性質到底為何，則值得推敲。宮崎市定以為解決此一問題的端緒是《水滸傳》的編纂背景。《水滸傳》於人物描寫之妙，其栩栩如生的所在，或許即是市井庶民雲集而藝人表演其特技神采的當下。《史記》的編纂或許也有相同的背景，中國古代也有類似近世都市文化發達的現象。《史記》逼真地敘述人物的行動和歷史的場景，其來源或許即是當時市集流行的講演藝術。

#### （四）結語：

京都史學研究的特質，內藤湖南以為《史記》的取材除了歷代史官的記錄以外尚有當時民間雅馴的傳說。貝塚茂樹說「雅馴」的基準就是「六藝」，以「六藝」的古典準據而取捨文獻，編纂史書，則是近代西洋史學記述的方法。宮崎市定從探本溯源的觀點，考察「傳說」形成的可能現象。宮崎市定以為《水滸傳》之能傳神地描寫英雄豪傑的神彩，是因為有近代「都市文化」的極其發達的社會背景，以此窺測《史記》的記述，司馬遷之所以能如臨現場的敘述荆軻刺秦王、鴻門之會的場背，未嘗不能說是當時《市集》之講唱文化的產物。

#### （二）、現場討論：

張寶三先生認為連教授在這篇論文中雖有其可取的觀點，也有其討論的地方。從論文題目來說，本論文題目叫做〈日本京都中國學派的《史記》評論〉，就從內容來看，不只是評論部分，在綱目下都是以詮釋為名，用詮釋為名具有概括性，張寶三先生建議是否將標題中的評論加以修改為《史記》的研究或詮釋。另外提到宋代「瓦市」講唱的藝術，並且在論文中也提到《史記》的編纂或許有相同的背景，中國古代也類似近代都市文化發達的現象，在一般庶民娛樂場所的「市」，不但有各種既能的表演，以娛樂市民，也有在不違反當時政治主權這的前提下，提供市民知識來源之歷史故事的說講。後面連教授用講演藝術及講唱文化的產生來說明《史記》創作的背景。不過在宮崎部分可能連教授過於匆忙與原文有一點出入，宮崎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娛樂場所，是指市民互相傾聽、互相雜談的休閒的地方，並沒有如宋代的講唱的藝術或場所，如果照連教授的說法把講唱文化提升到漢代，相信一般的學者也不會同意連教授的看法。另外本論文介紹內湖、貝塚、宮崎等人在《史記》研究後，就京都學派由內湖到宮崎有關《史記》研究的變遷及京都學派史學的特色，這部分可以再作探討會充實些。本論文第 101 頁又提到東京方面的史學研究，如果能夠將京都學派的特徵來對照東京學派的特徵，並把這兩邊的史學研究方法及成果作一比較，更能顯示出京都學派在《史記》研究的特質。

#### （三）、心得感想：

經過連教授論文的提示，個人得以了解日人對《史記》研究的用心及深入，這篇論文雖有其創見，但個人對某些論點持保留態度，如連教授指出宮崎認為《史記》在創作時，有受類似「瓦市」講唱之影響，這種的論調是否可以成立是值得討論，當然這篇文章主要在評論京都學派對《史記》研究之概況，開拓個人對海外在《史記》上研究的了解。

## 論文二：《史記》的學術根基

論文發表人：陳桐生先生

特約討論人：顏天佑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前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史記》這部文化巨著學術淵源和學術宗旨的簡要概括，他表明王官學六經異傳和諸子百家之學是《史記》兩大學術淵源，《史記》就是在經學和子學的堅實基礎之上構築成自己的大廈。出色地完成了整合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的使命。

### （一）司馬遷的師承淵源和學術素養：

關於司馬遷的師承淵源，前人曾有司馬遷從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學《春秋》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之說，由於孔安國習《魯詩》，因此人門推測司馬遷受孔安國影響而習《魯詩》，司馬遷還從乃父司馬談那裡繼承了楊何的《易》學。在這些說法之中，能夠視為定論的只有司馬遷的《易》學淵源。司馬遷從董仲舒受《春秋》之說多為今人所認同，但這個說法實際上還存在著許多疑問。司馬遷非常重視學術師承關係，但《太史公自序》卻對自己師承董仲舒一事隻字未載。《漢書·司馬遷傳》亦不載司馬遷從董仲舒受業之事，從漢至唐也沒有任何人說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及門弟子。最先發明此說的是宋人真德秀，而這句太史公已有一千多年了。真是最重要的依據是《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余聞董生曰」，絕不能因為司馬遷採用董氏公羊學之義就說司馬遷師承董仲舒，司馬遷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之說見於《漢書·儒林列傳》，《史記》對《堯典》五篇兼採用今文遠遠多於古文，所以《漢書》的說法是大可是值得商榷的，司馬遷確實讀過古文《尚書》，也許與孔安國有過直接接觸，但這種「問故」應該是臨時性的請益而不一定是及門弟子，這樣才能合理地解釋《史記》兼採今古文《尚書》而今文多於古文的情形。那麼司馬遷的學問源於何處呢？我認為大史公的經學和子學均出於家學淵源。司馬談是西漢前期最博學的學者之一，這不僅是因為他作為太史令必須學通天人古今，更重要的是他有著振興史官家世，做史記上繼孔子《春秋》的宏偉人生抱負。司馬談已經完成了轉益多師的任務，對於司馬遷來說，他只要從乃父受學就可以了。司馬遷所讀的金古文經傳文獻可以實證的有六經異傳及諸子百家著作二大系統，司馬遷是他那個時代讀書最多文化知識最豐富、理論素養最深厚的人，《史記》是吸收此前文化學術成就最多的巨著，司馬遷是他那麼那個時代，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崑崙。

### （二）論《史記》厥協六經異傳：

在六經異傳之中，司馬遷是以《春秋》經說為主，在《春秋》三傳經說之中司馬遷是以董氏公羊學為主，而在董氏公羊學所闡發的諸多經義中，司馬遷以孔子做《春秋》當一王之

法說爲主。使之成爲奠定孔子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特殊地位的一個核心觀點，這個學說的理論內涵是：上古五帝和夏商周三代都曾創造過王道政治的黃金時代，形成了以仁政德治爲核心內容的王道文化傳統，六經從不同層面而共同體現了上古三代所形成的王道文化精神。但是自周代末年王室衰微禮樂崩壞，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學術使命就是要落實孔子在六經，特別是在《春秋》中所寄寓的王道主張。這個學說實際上勾畫了一個中國文化發展史，它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描述成一個王道文化傳統形成、中斷、重建的歷程，孔子就處在中國文化發展特別重要的上承六經文化傳統，而下起戰國秦漢文化事業的中樞地位之上，由此孔子成爲一個劃時代的文化巨人。《史記》就是在上述意義上採用孔子做《春秋》這一學術觀點。確立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樞紐，就是解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最大關節，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也就清楚了，《史記》的文化學術框架也就奠定了。司馬遷就是在這個理論框架之下「厥協六經異傳」。

### （三）論《史記》整齊百家雜語：

「整齊百家雜語」就是要將立論殊方的百家雜著整合成一個統攝在經學之下的互相協調的學術體系，司馬遷對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盤否定，而是取捨短取長，公正客觀地分析各家學說的得失利弊。司馬遷對道家的態度最值得我們注意，他通過其父而得黃老道家學說的真傳，在諸子百家中，《史記》肯定得最多也是道家。人們發現儒學與黃老形名之學是從戰國中後期到漢初兩股最大的學術勢力，現在我們終於明白：司馬遷是通過體力的設置，以這兩篇傳記作爲「整齊百家雜語」的綱領，藉以突出以老、莊、申、韓爲代表的黃老形名之學，和以孟、荀爲代表的儒家在戰國秦漢之際的顯學地位，由此而達到既覆蓋全面又突出重點的目的。

### （四）論《史記》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學術成熟的最高標誌，但是《史記》構建一家之言的方式卻不是自我創新，而是既有的文化學術成果進行整理、選擇、協和，這用孔子的話說，是「述而不作」，用《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話說，就是「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這不是說司馬遷缺乏理論創新的才能，司馬遷是中華民族文化學術史上最具有原始創新能力的精英人物之一。他之述而不作，實在是由中國文化學術的傳統和當代所決定的，在司馬遷之前，中國已經積累了太多太多的文化學術遺產，司馬遷時代人們普遍心態不是追求創新而是學術整合，不是標異而是選擇，把歷史經過證明是正確的文化學術內容選擇出來，整合爲一個思想體系。這就決定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不是再像戰國諸子那樣再創新一個新學派，而是寓創新於批評、揚棄、選擇、吸收的形式，這是時代對司馬遷提出的要求。問題不在司馬遷是述還是作，而是看《史記》所選擇的所肯定的是什麼，所批判的所拋棄的是什麼，從學術選擇的角度看，《史記》把民族文化中許多最寶貴的東西保存下來。司馬遷所確立的中華早期帝王世系爲民族心理所認同，五帝三王的世系就作爲穩固的知識系統傳之後世，這個知識體系對於華夏民族的生存與繁衍，對於增強華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無論怎樣估計不爲過高。他都不會否認自己是炎黃子孫，僅此一端，《史記》就可以與西方的聖經相媲美，司馬遷就堪稱中華民族的英雄，漢初的今文經學充滿了改革社會的英風銳氣，洋溢著政治創新精神，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史記》接受並傳播儒家和六經異傳所共同創造的關於孔子知識體系，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形成。他以「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爲取士標準，這實際上是

對時代價值觀的提煉，他的《史記》體現了中華民族在結束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特有的剛健篤實、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堪稱華夏民族的一部激情澎湃的史詩。《史記》的選擇並不全都市積極健康的東西。如：《史記》中存在著種種從經學和子學吸收的迷信、因果報復、天人感應之類的思想，是《史記》思想體系中的缺點當然也是出於時代的侷限。

### (二)、現場討論：

顏天佑先生說：我個人提出三個肯定、一個商榷及一個遺憾。所謂三個肯定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是結束長期混亂時代，亦是長期分裂逐漸趨向統合學術思想的時代，諸子百家經過百家爭鳴、焚書坑儒、火燒咸陽、到漢代廣開現書之路，劉向、劉歆父子整理中央藏書，學術走向統合因此漢代是一個特別的時代，司馬遷正出於這個時代加上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司馬遷有其特殊的家學淵源及條件，使得他能看到密室書籍，能為漢代的學術作一整理，陳先生的這篇論文既不從史學或傳記文學來討論，而是從學術文化的角度來論述，本文的架構由厥協六經異傳，整齊諸子百家，到成一家之言，結構是非常清楚的。而本文約有兩萬餘字，雖然牽涉的內容很廣，基本上旁徵博引來論證《史記》的面相，而處理資料頗為恰當，是值得肯定。至於一個商榷：在本文中陳先生言後人在研究《史記》多是以史學或傳記文學作為研究的範疇，所以陳先生是以學術文化作為研究方向，這種的論點是有商榷的地方，〈太史公自序〉以說出作史著眼於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書、樂之際說要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理百家雜語，這裡就很清楚表明了《史記》的旨趣。就是要繼承孔子王道文化精神，但陳先生在引用原文時並沒有引完整才有這樣的推論。一個遺憾：由於本論文用兩萬餘字寫成而這論文題目太大了，其實要討論內容還有許多，不同的出發點當然有其不同的結果，陳先生從學術的觀點來討論《史記》的意義，自有其價值所在。

### (三)、心得感想：

聽完陳教授的論文發表後，再讀他的大作，私下覺得論點相當的好，除了讓自己可以從史學及文學角度了解《史記》外，還可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史記》一書的意義，這對於了解《史記》是有幫助的，若要從學術方面去探討《史記》的內涵，以陳先生的某些觀點為出發點或許會有幫助吧。

## 第六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10：40~12：20)

會議主持人：包根弟教授

論文一：《史記》豈不載有用之文

論文發表人：蔡信發先生

特約討論人：許鈞輝先生

### (一)、論文摘要：

明·王鑿謂《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傳〉不載〈治安策〉等疏，比《漢書》疏略，有清趙翼承其說，以《漢書》之錄〈治安策〉，是多載有用之文；民初梁啟超繼之而直截說：《史記》純以賈誼為文學家，專錄〈鵬鳥〉、〈弔屈原〉二賦，未載〈治安策〉等疏，不如《漢書》周詳難見全貌。竊以王氏啓其端，趙氏推其波，梁氏助其瀾，皆僅見一端而未識大體。(1)《史記》略書乃其義法：太史公亟重視傳中人物的著述，如太史公為孟、荀作傳，太史公就詳加稱引，一則可保存文獻，留待後世參稽；一則藉以襯托二儒所遇不合，甘於寂寞，不計世俗榮枯，益發令人欽敬。(2)《史記》非不載有用之文：太史公選文，識見高遠，取捨有度，當然被選之文的作用也就高度發揮，因此，文之有用與否，應作此解釋，斷非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而落得個「濫」字。接著，筆者對三氏批評《史記·賈誼傳》不載〈治安策〉，作一辨析，以正視聽。(3)主旨有別，錄文自異：太史公為賈誼立傳旨在敘其「懷才不遇，忠而見放」。因此，其政治主張和施為只做略寫，於是，太史公就以其〈弔屈原〉〈鵬鳥〉二賦組織成文，可見太史公認為他只是個浪漫的文人，對政治環境認識不清，且品行高潔，至清無友，不適在官場發展，然其辭賦之作，則雅麗可誦，卓然成家，可上繼屈原，下啓枚乘、司馬相如，自有其不朽的地位，而事實證明太史公的觀察是明確的。(4)體例相左，選文不一：《史記》是通史，有合傳一例。太史公取戰國屈原與漢初賈誼為一傳，除主旨一致外，二氏另有相同之處凡七，於是太史公取屈原〈漁父〉、〈懷沙〉，賈誼〈弔屈原〉、〈鵬鳥〉使其論調能一致。(5)文體不類，取材難同：他就巧妙採錄二人傷感的辭賦，藉以載事，組織成篇，使文與人合一，情與意相切，以文類歸類言，今人李長之說「《史記·屈原列傳》純然是在抒情的氛圍裏。」準此而此，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合傳，自然要顧及全文的氣脈，出以抒情，與之相成；否則合傳怎麼寫成？又怎麼顯其精神？據以檢驗，則《史》、《漢》得失，即可立判，終謂鄭樵以龍喻史公，豬比班固，不免失之於苛，然參以曾國藩云「班氏宏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則二氏優劣，概可想見。作者無意揚舉史公，貶抑班固，只是自來學者好以二者相比，未能得其精要，爰就主旨、體例、文體三項，析論於上，希能解此糾葛，悉其要終，至於班固從〈儒林傳〉抽出董仲舒，增以其作〈天人三策〉以成單傳，其旨一如妄議《史記·屈原列傳》之不載〈治安策〉，而參以筆者上列三項以辨之，即可釋疑解惑，豁然開朗。

## (二)、現場討論：

從明·王鑿、清·趙翼、民初梁啟超三人對《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傳〉不載〈治安策〉，來說明《史記》比《漢書》簡略，蔡教授認為這說法是「僅見一端，未識大體」，《漢書》固然有其史學價值，但從這一點來看是否可評論其高低呢？蔡教授認為太史公在人物著述中有作品，傳也一定會在文中提及或略述。蔡教授認為所謂用文有三點條件：1.文章要與史記本文有關才收 2.體例不合 3.文體不類，定位文學而不是文獻，因此〈治安策〉與《史記》的體例不何故收錄於史記如此情形，《史記》在前，《漢書》在後，而《史記》是否不收史官文獻呢？關於這一點蔡教授可以說明一下，因此蔡教授所提的三個條件是針對王鑿認為《史記·董仲舒傳》不收〈天人三策〉、《賈誼傳》不收〈治安策〉，這是《漢書》周詳，《史記》疏略之處是不正確。從本文來看蔡教授寫作的動機很明確、條理清楚、觀念明確、態度嚴謹。下列我提個人的淺見：蔡教授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個反問口氣這種反問

口氣是語氣很強的，所謂有用文是什麼？在相對前提下充滿了討論和商議，在我看來這三位學者是錯的，蔡教授提出他個人的看法作為學界對這鑑事的不同的看法。

### (三)、心得感受：

這篇論文甚有見解，前人認為《史記》疏略，《漢書》詳細。作者提出他個人研究的結果，經過反覆論證，並以太史公寫作的主旨、文體、體例等各方面，與《漢書》的寫作的觀點析論二書的異同，否定王鑿、趙翼、梁啓超等三人的論點，作這認定司馬遷所載之文皆是有用之文。

論文一：《史記》「不連貫句子」和司馬遷的編撰方法

論文發表人：倪豪士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教授

特約討論人：蔡宗陽先生

#### (一)、論文摘要：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我們可以從當代學者王立器的注解來展開對這句話的探討，王先生有注曰：「成湯」二字專提，表示下文專記成湯時代的大事，章法上并不連屬。吳樹平和呂宗力在《全注全譯史記》上認為「成湯」兩個字是衍文，這種看法可能是受到清代學者影響。梁玉繩、瀧川龜太郎也看成衍文。「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公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不連貫的句子顯然是「仲姬、戎姬」，王利器先生在譯文時加上「又有」兩個字，梁玉繩根據《左傳》把「仲姬、戎姬」改成「仲子、戎子」，王叔岷認為「史公以『仲姬、戎姬』代《左傳》之『諸子仲子、戎子』似無脫誤。」「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史記·齊太公世家》）關於「齊秉意茲」這一斷句問題徐廣云：「《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梁玉繩、張文虎、王叔珉都根據《左傳》的說法，把「秉」改成「邴」，並在意茲後加上奔魯二字，「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以死矣，欲誅其子趙朔。」梁玉繩認為「韓厥」二字事疑衍。王叔岷認為「韓厥」非衍。「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至〕趙夙。」王念孫認為是「至」字古代版本都沒有「至」字。只有王叔岷指出錯誤。結論：個人以為太史公撰寫《史記》非一人之功，因為太史公的部屬有三十餘人之眾，來替他整理資料，太史公負責大半的工作，可能是那些部屬在協助抄寫時，把刻寫在竹簡頂端上的資料或人名直接抄入正文中，才造成上述種種不連貫句子，這種說法卻可以用來解釋不少《史記》裡的不連貫句子原因。

#### (二)、現場討論：

本文中隱含文法及修辭，我個人就以文法修辭方面來評論本文。

倪先生發現《史記》有跳脫現象，他把這種叫不連貫句子，其實在中國叫上下句不連貫而非不連貫，首先從題目上來看，如果把題目改成《史記》的跳脫，而跳脫是寫作文章的一種方法，這樣題目既簡潔又貼切，所謂跳脫；指的是在語文中由於新意的急轉或新意的浮出語言半途轉換了，叫做跳脫，跳脫有四種現象：突接（在第 169 頁中「上無所承，不似起語」

這句子就是叫突接)、插斷、插語、脫略(第169頁「下無所接不成收語」)。在他前半不連貫句子中跳脫的現象有兩種,如果倪先生知道中文修辭中有跳脫現象,也就是司馬遷寫作方法之一,至於倪先生懷疑為何用的很少?一般寫作文章跳脫的使用是比較少用的,下面是我個人的淺見:第169頁中如能加入寫作的動機並給於一個標題「跳脫的探析」會比較清晰,其次第135頁用結語來代替初步結語會比較適當。

### (三)、心得感想:

倪教授雖是外國人,但在中文的造詣可說是深厚,對於《史記》研究十分的用心,在他的論文裡所提出的觀點,可以看出他對語法上見解,或許值得我們注意,倪教授舉《史記》中的例子有其獨到之處,或許對於中國修辭方面未有了解,否則他可以做出更深入的剖析,相信可以給我們後學者獲益匪淺。

### 論文三:梁玉繩之《志疑》與崔東壁之《考信》

論文發表人:李康範先生

特約討論人:林慶彰先生

#### (一)、論文摘要:

梁氏與崔是二人以不同治學的態度辨析史記,梁氏篤於考據,頗得乾、嘉諸儒之讚許,崔氏滿懷疑古。梁氏所「疑」者,非太史公原文,而是傳下一千九百歲當中所產生之各類錯誤也。崔氏所「疑」者,非太史公原文,而是六藝也。是以對《史記》而言,說「疑」者實信,說「信」者實疑也。本文就乾、嘉時期考據方面,代表考據主流的梁玉繩,以及雖與梁玉繩同時而處於乾、嘉學風之外,滿懷疑古精神以辨析《史記》崔述二人為題,比較二人之治學態度與方法、研究成果、得失、「疑」與「信」之對象,以及對後世之影響等。梁玉繩就一字一句之史事,一字不放,仔細考證。其碩果可分為考訂文字、地名、人名、年月、書名、缺補等以及考訂史實。梁玉繩之考訂史實文字,大多皆不長,其間或以較長文字敘述其觀點,如以〈伯夷列傳〉之文辭最不可信,提出十條之理由。這十條理由中,與古籍記載不合者有五,不合義或理者有三,無法確定證據者有二。其中梁玉繩所依據之文獻當中,亦有《戰國策》、《漢書》等書,如同時期考證學者,梁玉繩亦以六經之外,秦漢以來的史書、子書皆當作依據。至乾嘉現傳的古籍與司馬遷取資之材料是否一致?現傳史料是否保持原貌?如兩者不符?一定是《史記》有錯嗎?此等問題一時無法解決。梁玉繩亦於如此問題往往見其武斷之病。

崔述作《考信錄》的目的在於撰述完整無暇之一部《孔子傳》。為此先辨別邪說與偽學,以防誣聖人。所以崔述從此著手剔取當疑者而去之。崔述最不信戰國縱橫家之托言,此作為崔述撰寫《考信錄》以辨其真偽之主要動力。崔述之著作宗旨大約為二,第一、尊信聖人與聖經;第二、考辨古書真偽是也。但前者遠遠超越後者,其殊異始終未能擺脫「三衛」之色彩。對於五帝,梁玉繩認為司馬遷不提三皇而自五帝始述是最合理的。崔述則完全否定五帝本身之系統,崔述徹底不相信秦漢以來的史料,《史記》亦當然列在其中。但其推翻〈五帝本紀〉系統,可稱之為卓見,崔述認為此並非五帝之實錄,而是司馬遷全襲六國時人之假托。



結論：但如此學術環境與乾、嘉學風無涉，可謂對發揮自己疑古精神有助。換言之，經、史研究不受家法之影響，正如齊思和云：「（崔述）和乾、嘉時期的漢學家不同，漢學家是尊崇漢儒家法的，崔述是不受他們的束縛。」崔述死後一百年寂寥，至民國初年，始有蘇南的顧頡剛及皖南的胡適之給予頗高得評價，以此崔述的超越時代性來看是理所當然的。梁玉繩著書取名《志疑》，其疑之對象非《史記》原文，而是司馬遷以後至乾嘉年間的這一千九百年之間的抄寫、刻印等在流傳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其目的在於力圖糾正錯誤，恢復《太史公書》之原貌。然崔述雖借司馬遷之「考信於六藝」而取名《考信錄》，但其信之對象，只有六經，絕非《史記》，對《史記》始終持有懷疑的態度。因此對《史記》而言，梁玉繩說「疑」者實信，崔述則說「信」者實疑也。

## （二）、現場討論：

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專門修正史記一千九百年的種種錯誤，也把修正史記錯誤的部分成考訂文字、人名、地名、年月、書名、缺補等及考訂史實，均有舉例且表裡十分清楚，可見他在《史記志疑》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剛才李教授說梁玉繩用了一本壞的《史記》版本（《史記評林》），這樣的版本作為他校勘的底本，是否要顯示出他的考證功力呢？我們可看出李教授有指出梁玉繩使用版本不當的地方，另外討論崔述用了二十幾年來研究先秦兩漢始作了《考信錄》，以現在人來看崔述比較依循聖人之言，《詩經》、《尚書》、《論語》等書，崔述絕對懷疑它，因為如此影響了《考信錄》一書的權威性和成就，李教授也把他提出最後二人比較其結果是梁玉繩比較相信《史記》，崔述比較不相信《史記》，以五帝為例，五帝為何以？誰是五帝的代表？有討論的空間。下面個人提出個看法：

1. 寫作時提到的人物有時用字號、有時用名、不是十分妥切，應加以統一。
2. 提到《史記》有時又以《太史公書》是不太統一。
3. 本文各段落只有數字若能加上標題會更好。
4. 文章中簡體字太多、錯別字也不少。
5. 138 頁引柳詒徵之言並非如李教授所言「以乾、嘉時期之史學研究絕不亞於經學研究。」142 頁「與梁玉繩同時有出自北方大名的崔述」，北方一詞地區太大崔述是河北人若用河北會更好。143 頁宋儒疑經文之大膽一辭世有疑問的，一般人都是認為宋儒是疑經的，其實宋儒疑的是漢人所傳的經，宋儒也尊經，尊的是先秦的經，而不疑經書得本身。143 頁末行言崔述盲目尊信「聖人」，對於自己學問體系帶來致命的打擊，這種說法要注意詮釋這得時代性，詮釋者的時代性在解精實不可能是盲目而不了解時代。

## （三）、心得感想：

用考據學來討論《史記》在時代的傳承，可以了解《史記》在不同時代學者看來具有其不同的意義，梁玉繩是研究《史記》的專家，對於他在讀《史記》後所得之心得，寫成《史記志疑》亦作為研究經學是有其創見。崔述也研究《史記》在他的《考信錄》一書中也對司馬遷的書作了詳細考證提出他的見解。此場的論文研討從清初考證切入可以讓我們了解清初學者對《史記》的態度。

## 第七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13：30～14：40)

會議主持人：賴明德先生

論文一：〈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

論文發表人：陳麗桂先生

特約討論人：韓兆琦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是論述先秦諸子的重要文獻之一。根據司馬遷的說法，這是其父「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所作。如果所言屬實，則撰作之初，本有糾導學者論學之微意，當然有其自我之學術立場。全文見載於《史記·自序》，僅九百二十六字，層次分明地包括三個段落。第一段是引論，只有 42 字，提出六家之名，並引《易·繫辭傳》殊途同歸之文，說明六家皆歸治道。第二段是「論」，共 288 字，提挈六家學術之大要及其得失。第三段是說(解)依次說明六家學術所以優劣之故。六家理論，理趣雖各不相同，其目的功能，司馬談認為，皆一致地朝向政治、社會問題的處理。換言之，都通向外王的目的，要求外王的成效。

〈論六家要旨〉站在「為治」的觀點論說各家。全面推崇黃老道家因陰陽、採儒墨、撮名法之「術」，並據以論判各家學說。他以黃老道家的清靜儉約、虛無因循，肯定陰陽家因順天時，反對其忌諱繁瑣，與名家(辯者)之苛察繳繞，儒家六經之博而寡要。以黃老道家之君逸臣勞、重刑名，否定儒家之君勞臣逸，肯定法家之「尊君卑臣，明職分」與刑名家之「循名責實」。又參採墨家之強本節用，盛讚儒家之修明人倫，並據以批判法家之不別親疏。終歸結於黃老道家寧靜節制的治身術，以為「為治」之先決條件。他其實是以摛探答家之長的黃老道家之學，逆向批判各家之失。

一、五家之得失：它稱陰陽家所言是一種「術」，六家之中，唯陰陽家直接稱「術」，其餘則或稱「儒者」、「墨者」，或稱「法家」、「名家」、「道家」雖稱家，卻繼而說，「其為『術』也……」。在司馬談看來，「道家」也是以「術」行世。陰陽之學內容太過枝節，忌諱又多，令人行事多所畏忌，是缺點。然亦肯定其依順四季以長養萬類的大原則，是治政的綱紀。繼而論儒家，他肯定儒家修明人倫之功，卻反對其以六藝教人，以為太過繁富龐大，窮其一生難奏功。這和《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48 章)，《莊子·養生主》「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的道家本調是一致的。他說墨家尚儉太過，要求人居室簡陋、衣粗、食惡，又非禮、非樂，人生最重要的養生、送死兩大事，都是一式地粗陋草率，站在「為治」的立場，如此要求人君：非特啼笑皆非，而且君民一同，尊卑無別，是其反對的第一因。其次，時代在推移，文明在進步，物質益愈發皇是必然的趨勢，千古一式的粗陋清簡，絲毫不具普遍的可行性，是其反對的第二因。然而，墨學要求奮耕力農，隆抵物質用度，增加生產，減少消費，是最古老的致富原則，仍應予以肯定。他說法家明法審令，打破周代封建宗法親親尊尊架構下的名位獨佔與資源分配，企圖透過「法」來齊一西周以來以血緣為依據的權益參差，可收短效，而難以久長。然法家尊君卑臣，組織嚴明，人各一職，權責分明，是各家唯一正面針對「為治」的終極目標。他說名家「儉而失真」，所謂「儉而失真」，「儉」不知何所指？「失真」則易解，指的是其理論「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情，專決於名，而

失人情。」司馬談肯定法家因任授官，以督核臣下之刑名術，否定顛覆傳統思維概念與語文表述習慣，與現實人生中人與人之實際交流狀況有很大落差的名家辯者失真之說，或許是他基於「務為治」的觀點所作的考量。最後論說道家要旨，不論論或說解，道家都是六家中最長的，次序列最後，內容也最豐富。尤其特別的，各家皆有得有失，且先論失，後述得，唯獨道家，詳述其術，說其得，而不見其失，並以之總結前五家之意味。稍加觀察，即可發現，不論論或說，「道家」部分內容大致可分為二層；第一層論說其稟承先秦道家清靜虛無的思想精神，及其源自刑名法家，因循無為、主刑名、講時變的為君治國之術。第二層論述其儉約節制、形神並重的治身之理，並以之為治國之先決條件。

二、〈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

(1)、為治與尚功：〈論六家要旨〉一開始即經提出了所選六家之說皆「務為治」。明白告訴我們，他選六家是以「為治」為考量，以後它批評各家，大致也是站在「為治」的觀點來發論。不僅如此，〈論六家要旨〉還尚「功」，它批儒家六經「勞而少功」，稱揚道家之術「事少而功多」，說墨家尚檢，忽略「事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儉而難遵」；「法家」斷親親，「不可長用」；說道家之刑名「何事不成」？都是站在尚「功」要求成效的觀點而批判的。

(2)、由道到術，由老子到黃老：司馬談將道家之學詮釋為一種「術」，這樣的說法是很有時代性的。它反映出西漢人對老子「道」的理解與應用。與〈論六家要旨〉同為論述先秦諸子重要篇章的漢志〈諸子略〉同樣說道家之學是一種「術」，一種「君人南面之術」。

(3)、采儒墨，撮名法：其采名法的時變觀念，與「虛靜因任」、「循名責實」的刑名術，其采之儒墨的，則就西漢文景黃老治期各種慈惠、清儉、省刑之德政看來，（參看《西漢會要》），黃老「道家」確實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吸收了墨家「強本節用」的主張，希望能「人給家足」。

(4)、因陰陽之大順：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不但以陰陽家起論，列「陰陽之術」為第一序，並且在他所唯一推崇的「道家」之學中，擷探了「陰陽之大順」，較之班志論述黃老「道家」更為精確。黃老之學本來就跟陰陽之學有深厚的淵源。

總之，司馬談在六家中唯一肯定「道家」，他並以之批判各家。他所界定的「道家」，非老、非莊，而是以老子虛無、清靜、柔弱、去智為主體，結合時變的觀念與刑名術為主，再吸收部分陰陽家的學說與儒墨慈惠、務本、節用等觀念而形成的，重視治國與治身之術的黃老「道家」。他也就以這種統合眾家之長的黃老「道家」之「術」去批判各家。五家之中，舉凡他所肯定，所論為「得」的，皆為他所「因」、所「采」、所「撮」；反之，他所批為「失」的，皆在不采之列。終歸結於寧靜節制的治身之術，以為「為治」的先決條件，明顯顯示了黃老「道家」的立場與特質。

（二）、現場討論：

1. 本文主要的論述觀點，以為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道家即為黃老之學，這種觀點頗富創見，發人深省，值的給予多多的肯定，也值得專家學者們進一步深入探究。
2. 〈論六家要旨〉一文在政治思想史、學術思想史、黃老思想、道家思想及先秦諸子思想上所具有的定位與影響，是否也應在本文中論及，以達到文章的完整性。
3. 本文第一章最後一段的小結論段落裡第3行「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黃老道家才形神並重、交養。」這一小段文字應該可以刪掉，因為在先秦諸子百家中，重養生者一為道家，一

爲儒家，其他如墨、法、名、陰陽等各家則很少提。《莊子》書中養生之說隨處可見，重養生是道家學說的特點，到了黃老思想之後更是其學說重心之一，因此，似乎不需要特別去說名、強調。

4. 本文第一章的第二小節「道家之要旨」似乎可以合併到第二章「〈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一起來談，如此一來，文章的結構將會更簡潔精警些。

5. 在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文中我們只見其談論道家思想，而其黃老思想部份似乎並不明顯，可否請作者在論文中多引證相關的典籍資料，以證明〈論六家要旨〉的黃老思想傾向。

### (三)、心得感想：

本文針對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之內容頗有其精闢之見解，然文章重心卻幾乎著重在道家及黃老思想上，對於其他五家學說的闡說則略嫌簡單，以此觀之，若對應其題目「〈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而言，似乎頗有偏廢。若能於題目上略作修正，或加注一副標題，應能更爲妥切。再者作者以爲〈論六家要旨〉文中所謂的道家，事實上並非完全等同於老、莊道家，而是傾於西漢以來的黃老思想，但文中卻未立一章節比較此二者之學說異同及其淵源，難以令讀者確實瞭解其間之差異與關連，實爲可惜。此外，作者論文的標題是「〈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而其文中第二章的章題也是「〈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論文的篇題與內文章題重複，會不會造成整篇文章的內容失衡，結構不全的毛病呢？

論文二：黃老思想與《史記》中的范蠡、張良

論文發表人：韓兆琦先生

特約討論人：林麗娥先生

### (一)、論文摘要：

范蠡是中國古代政治家中“功成身退”的楷模，是古代文人理想的化身；他滅吳霸越的輝煌事功與「散髮弄扁舟」的瀟灑隱退，都令後人仰慕不已。但是在最早記錄吳越史事的《左傳》中並無范蠡其人，《國語·越語上》也隻字未提范蠡，〈吳語〉中他雖出現兩次，但也只是個夾在眾人之中一帶而過的無足輕重者。而偏偏到了〈越語下〉，一下子變爲專門寫范蠡，便范蠡一躍而成了越王句踐的佐命大臣，地位在文種之上。這種記載不能不讓人生疑。若將〈越語下〉中范蠡的言論與 1973 年馬王堆出土的《黃帝四經》對照，可發現兩者語句相類或內容相關的部份竟多達二十餘處。唐蘭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卷本前古佚書的研究》一文裡把《黃帝四經》的寫作年代大致定在「戰國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 400 年前後」。據此，我們推測多處摘錄《黃帝四經》的〈越語下〉很可能是戰國中後期的黃老學派所做，而范蠡則是該學派藉以宣傳其理論主張的一個傳聲筒。司馬遷寫〈越世家〉，所敘范蠡事跡多採自〈越語下〉，但較之〈越語下〉又有許多新發展。

一、司馬遷筆下的范蠡有著漢初現實政治的影子：

〈留侯世家〉中的張良，與〈越語下〉中的范蠡，其思想、性格，以及爲人行事的種種表現是非常相似的。宋代楊時曾說：「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個虛無單弱底人，到緊要處發出來令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張良的這些表現，我們幾乎都可以從〈越語下〉之

范蠡的活動中找出其先有的程式。〈越語下〉中的范蠡的活動是後人加工的，而現實中的張良才是真正的黃老思想者，或者說是《黃帝四經》的第一個自覺的實踐者。宋代司馬光說：「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之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資治通鑑》）這就是〈越世家〉所寫范蠡致文種書所由產生的時代背景。而現實中的張良的確要比〈越語下〉中的范蠡更生動、更豐富。所以司馬遷正是頭腦中轉著張良的影子，熔古今史料於一爐，從而濡染大筆，進一步豐富了「范蠡」這一個人物形象。

二、司馬遷筆下的范蠡「信仰」與實踐脫節：

《史記·越世家》將范蠡的一生劃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他以黃老思想輔佐越王勾踐屈辱事吳，暗中發展國力，等待時機成熟後一舉滅吳，完全符合《黃帝四經》「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窮而因之」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柔弱勝剛強」之道。亡吳後，功臣中他本屬第一，但卻放棄名位榮利，飄然遠去，此又爲《老子》「功成而弗居」的具體實踐。可是到《越世家》中就不同了，司馬遷還把范蠡離開越國後的活動寫了一大串。他先是到了齊國「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在齊又當了一陣子宰相後，他「歸相位，盡散其財，遷居於陶。」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如果范蠡真的就像司馬遷寫的這種樣子，那他是一個「信仰」與實踐脫節完全脫節的人。

三、司馬遷筆下的范蠡荒誕不近人情：

〈越世家〉寫范蠡離開越國後兩次經商發大財，一次在齊國登上宰相高位，這都是非常火爆的事情，但司馬遷都著筆不多。司馬遷用筆墨最多的是寫了范蠡家庭中的一次重大變故，即范蠡的二兒子因在楚國殺人被楚國捕入監牢，范蠡想派他的小兒子前去營救，但大兒子對父親不派自己而深感委屈，因而爭相前去營救弟弟，導致後來其弟依然被斬首的故事。當全家上下傷心痛哭時，只有范蠡一個獨自發笑，只因爲他早已料到事情的結果。這個故事確實生動，表現范蠡的料事之精也確實精彩，只是讓人覺得不近人情，不可信。如果是預言別人家的禍福也還罷了；而現在是面對自己的兒子，難道就可以這樣忍心地用兒子的生命下賭注，以向妻兒鄰里證明自己的先知先覺嗎？

四、司馬遷寫范蠡與〈越語下〉頗異其趣：

前文說過，〈越語下〉大約出自戰國後期黃老學派之手，是爲了宣揚黃老思想而塑造的人物，因此作品對范蠡充滿了贊頌之情。《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跡的結尾處寫道：「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於「太史公曰」下又說：「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六句話中出了四個「名」字。「名」固然是司馬遷所追求的一種境界，但像范蠡這種只講權詐，毫無心肝，甚至可以用自己兒子的生命以炫耀自己的冷血鐵面，司馬遷是不是也一例予以贊揚呢？由於司馬遷處於這種兩難地位，他既要寫出歷史的真實，給歷史人物的具體事功以公正的評價，同時也要張揚傳統的美好道德，給黎民百姓、後世子孫良好的教化，因此凡是遇到這種兩難的時刻，他便對范蠡、張良、陳平等這種類型的人物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保留。他們可以建功，可以有名，他們的智能、手段可以讓人敬畏，但絕對不能讓人親、讓人愛，某些地方還甚至流露出司馬遷的某種程度的厭惡之情。《史記·越世家》范蠡

的種種不合情理的行徑，大概就是司馬遷對於黃老人物的一種隱隱嘲弄吧。

### (二)、現場討論：

- 1.文章簡潔通暢，見解獨特，針針見血，是一篇擲地有聲的作品。
- 2.文中提出了三個重點：(1) P161 前言中言《左傳》沒有記載范蠡，最後第三行「《黃帝四經》的〈越語下〉很可能是戰國中後期的黃老學派所做，而范蠡則是該學派藉以宣傳其理論主張的一個傳聲筒」部分，可否舉出較為明確的證據？(2) P162 第二段倒數第二行「所以司馬遷正是頭腦中轉著張良影子，熔古今史料於一爐，從而濡染大筆，進一步豐富了「范蠡的這一個人物形象」，以及范蠡是道家人物，又怎麼會出來求名求利？關於此點，林麗娥教授以為黃老思想和道家是不一樣的，道家是隱遁的，黃老卻是積極的，韓教授此說有待商榷。(3) P162.第三節〈司馬遷筆下的范蠡荒誕不近人情〉部分，左鄰右舍大家哭泣，唯獨范蠡獨笑，更可顯見范蠡有先見之明，然此笑應非得意之笑，而是苦笑。
- 3.對於張良、范蠡在歷史上被認為是成功人物，然司馬遷卻對其有某種厭惡及嘲弄之情的說法，林麗娥教授不以為然，因為黃老思想的特徵在戰國初期齊威王時代已出現，范蠡離此時代並不遠，而此思想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在儒、道、名、法各家各派中可見其蹤跡。其特色為 a.以道、法為主，道是老子，法是黃帝。 b.兼諸子學說之長。 c.主張積極權變。從這幾個角度來看，范蠡的行徑及思想受黃老之影響，並無突兀之處。
- 4.針對韓教授此文三個重點來討論： a.范蠡是不是黃老派所捏造出來的傳聲筒？並不一定是先有學派成立才有符合此學派思想的人出現。不能因為左傳沒有記載范蠡就否定范蠡不存在，況《左傳》與《國語》記載的內容取決觀點是不相同。 b.太史公寫范蠡時是否真的以張良為其塑造范蠡的影子？范蠡應不是太史公憑空捏造的人物，《史記》大部分應是一本實錄，這一點歷代以來並無太多爭議。 c.司馬遷不反對黃老思想，反而是對這些人的聰明才智、安邦定國，能明哲保身，善始善終，流露出讚嘆之情，這應與司馬遷個人境遇有關。對這些人之謀略，各為其主之用心，我們看不見司馬遷有貶抑之情。

### (三)、心得感想：

本篇論文提出范蠡可能是黃老思想者所虛構出來的歷史人物，立論非常大膽，然行文的縝密度及徵引的證據明顯不足，筆者只見作者在文中有許多大膽的假設，卻少見其博引典籍或出土文物來佐證，實屬可惜，且說服力相對薄弱。另外作者在行文的措辭上也有些許商榷的地方，例如說到史記中的圯上老人，作者卻以「鬼鬼崇崇」來形容，似為不妥；又如文中常以「我們」來當主詞行文，然而「我們」究竟是誰？是否該改為『我』或『筆者』較恰當？最後，本文的文章結構沒有前言，沒有結語，似乎並未完全符合我們現今的論文格式。

第八場：(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九日星期日 15:10~16:50)

會議主持人：黃湘陽先生

論文一：《史記·封禪書》的宇宙圖式

論文發表人：鄭志明先生

特約討論人：孫映達先生

(一)、論文摘要：

《史記·封禪書》記載了自舜以來，天子以巡狩的方式對各地名山大川進行祭祀，郊祀成爲國家體制重要的宗教活動，包括了天地、日月、四望、山川諸祭，是統治者神道設教的主要手段，背後反映了當時的宇宙觀念與信仰體系。所謂的「宇宙圖式」是指古代人們空間認知下所形成的宇宙式，是一平面開展的空間圖式，有一核心及對應四方八位的概念，就其核心來說是「天地人神」四位一體，主要是以人做爲主體，建構了人與天地，人與鬼神的和諧結構，發展出主客合體的生存空間。從封禪到明堂，祭祀天地的場所模式化，是古代宇宙觀的體現，與天圓地方的空間認知有密切的關係。《史記》封禪書記錄的不只是當時官方祭祀的史實而已，反映的是從遠古到漢初的宇宙認知模式，是生民集體創作的信仰觀念與儀式行爲，在長期文化的交織與累積下，表述了民族融通會合後的宇宙圖式與生存模式。封禪的祭上帝儀式，代表了人與天地神的合而爲一。這種中心的合一，進而要在人間的「五方」擴散，與四時五行的時空相對應，形成了圓形的五方空間的宇宙模型。

天地人神四位一體：古代帝王政權一直是維持著政教合一的形式，政治世界與宗教世界是緊密結合的，王權是建立在天人相通的信仰系統之中，帝王是受命而王的，即人與天是一個整體對應的和諧體系，大一統的人間帝王，成爲人的集體象徵，具有著貫通天人交際的權力與義務，是天界與人界的溝通者與代言人，「封禪」則是象徵著天人交通的宗教禮儀，是從古老巫術發展而成的一種政權象徵的工具與手段。司馬遷是有意假借封禪來建立國家正常運作的秩序，誰有權封禪不重要，重要的是爲什麼要封禪？其目的又在那裡？封禪在儀式上，就是祭祀上帝的禮儀，象徵著人間帝王與天界上帝，彼此也能合爲一體，相互感通，帝王的政治作爲是體現了天意，按天意行事。帝王是經由祀典，與天地聯繫在一起，掌握到上帝的天意，獲得天意的護持，進而能代天行道，替天來統治萬民。

「核心」與「四方」關係的五帝崇拜：天地人神雖然是四位一體，真正的核心還是在上帝的「神」上，進而發展出「五帝」信仰。「五帝」信仰受五行思想的影響，因五方而有五帝崇拜，來自於圓形的宇宙觀念，由圓心與環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生成世界，展現了「又圓又中」的宇宙認知圖式。五帝是建立在核心與四方的對應圖式中，太一與五帝的結合，則發展出核心與五方新的對應圖式，將五方的空間世界重新統整在新的核心之下，同時也把人間雜多的神祠向核心靠攏，各式各樣的神祇都應對著核心而來，多元並立，表面看起來是雜亂無章，實質上有著宇宙論的統合秩序。

祭祀場所的神聖空間：核心與五方的空間對應，反映出古代天圓地方的宇宙圖式，地的五方是籠罩在天圓心之下，在天覆地載下形成了方圓對應之道，神聖空間的祭壇，基本上是從方圓的空間佈置展開而成的。以外圓來包容內方，內方中又有中心的圓，形成了整個和諧的空間圖式。祭天時用圓壇以象天，稱爲「圓丘」，祭地時用方壇以象地，稱爲「方丘」。祭祀天神或上帝的聖地，或稱爲「時」。除了「時」外，「明堂」也是祭祀上帝的主要場所。

《史記》封禪書集了古代的各種天命意識，是多重文化的累積與交融而成，其內容原本

就極為複雜，但也有其內部和諧的基調，從原始文化到儒道等思想的形成，雖然作法與認知是不一的，其天人交感的心理卻是一致的，從宇宙變化的發展模式，論證帝王受命為王的神聖性，對人類社會歷史進行理解與詮釋，基本上還是追求王權與神權約合一，肯定天人是相互感應的，從日月、星辰、四時等自然天象，以及陰陽、五行等運行規律，來掌握其中的各種對應與互動的關係。像司馬遷這樣的史官是不反對祥瑞災異作為體現天命的媒介，是從天人感應的角度來建構其歷史哲學，企圖對天人宇宙發展變化模式作整體的理解。司馬遷對天人關係的理解，不是二元論的歷史觀，他肯定天道日月星辰的變化和人間政治關係的互相對應，希望從人文的立場，經由天道與王道的樞紐溝通，完成了天人交感的宇宙規律。

## (二)、現場討論：

1. 本篇論文旁徵博引，內容飽滿豐碩，材料詳實，見地深邃，值得深入研議。
2. 論文主體分三大部分探討：a. 作者對封禪行為之前因後果有精闢論述。b. P166. 第二章節〈天地人神四位一體〉中所言及之古代帝王是政教合一，封禪行為是象徵著天人交道的禮儀。c. 論文結論則對第二章節作了進一步的完整論說，說明了古代的王權與神權合一合一的必要性與和理性。
3. 論文第二章、第三章涉及到古代歷史、哲學的認識，是十分有創見，第四章有關祭祀場所的神聖空間的敘述令人十分感興趣。
4. 關於司馬遷對封禪儀式的文化現象之瞭解到底有多深入，今日我們又該如何認識辯證其正確性，確實是十分複雜而困難的學術問題。
5. 前言第二段 P165. 「司馬遷在撰寫封禪書時有著天人交戰的矛盾心理……暗藏著其文化批評的主觀立場」，P177. 「像司馬遷這樣的知識份子就有強烈的改革意識，想對原始蒙昧文化進行消除與擺脫的理性覺醒」，夾在宗教與人文之間的司馬遷對於封禪儀式是如何客觀寫作與主觀見解，在封禪中表現出來的此二者關係是如何反映出來？你是如何思考、論定這個問題？是否在您的論文中可以從人類不同認知角度、概念範疇及歷史動態演變的角度及正統觀念的角度進一步申論，以使得文章論證更顯周延。
6. P178 『司馬遷對天人關係的理解……肯定內在對應的文化訊息』是否可以進一步說明？

## (三)、心得感想：

這是一篇從《史記·封禪書》中出發去探索古代的信仰文化、王權特色及天人觀念的文章，是一篇內容十分博大專門且結構縝密、形式完整的佳作。〈封禪書〉原本就是《史記》一百三十篇中堪稱難懂的篇章之一，本文又從宗教、方位、陰陽五行觀點去談論西漢時期的宇宙觀，文中言及許多專門知識，實在非筆者能力可輕易解讀的，然對於其結論中所言之封禪行為事實上是透過祭祀天神上帝來達到人間的王權與邈不可知的天上神權結合之說，筆者深以為然。對於將上天視為意識天的觀點，遠至《詩經》、《尚書》、《孟子》等先秦典籍書中到處俯拾即是，時至今日依然有少數政治人物用此思想迷惑百姓，這也許就是民智未開的悲哀吧！



## 論文二：上古漢語中「VP 之 NP」的句法結構及其語義功能（兼論《史記》中虛詞『之』的結構與功能）

論文發表人：方環海先生

特約討論人：李添富先生

### （一）、論文摘要：

上古漢語中「VP 之 NP」結構的消失是漢語史上的一個重要變化，學術界一般認為該結構中的「之」字沒有提取句法成分的功能，「NP」也不是從「VP」提取出來的潛主語或者賓語，與現代漢語中「的」字正好相對。本文以《史記》中反映出來的語料為例，著重討論了上古漢語的「VP 之 NP」結構的語法語義功能。本文認為「VP 之 NP」結構在先秦古漢語書面語料中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這也是《史記》中較為顯著的語法特點。NP 與 VP 之間在很多情況下都具有隱性的主謂關係、述賓關係等複雜的句法語義關係，「VP 之 NP」結構中「之」字也並非那麼簡單，並隨著名詞性片語抽象性的逐步增強，「之」字的指稱性功能則漸趨減弱。《史記》是漢語發展史上一部相當重要的著作，反映了漢語語法特點的許多典型變化，「VP 之 NP」結構的變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所謂「VP 之 NP」結構是指在上古漢語中主謂結構的謂語動詞片語和名詞片語之間加一“之”字，從而轉化為名詞性的偏正結構，在句子中充當主語、賓語或者分句，也可以單獨成句。其中“VP”指組成“之”字結構的謂詞性片語，“V”指的是“VP”中的主要動詞，“N”則指的是名詞性片語“NP”裡的中心名詞，在上古漢語裏大多表現為單音節名詞。

「VP 之 NP」結構的消失是漢語史上的一個重要變化。我們在對《史記》中的漢語語料進行考察時，發現「VP 之 NP」結構在先秦古漢語書面語料中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這也是《史記》中較為顯著的語法特點。後來到漢魏六朝時期漸漸消失，並與上古漢語中的「者」和近代漢語「底」關係密切。本文以《史記》中反映出來的語料為例，從話篇、語用分析的角度著重討論上古漢語的「VP 之 NP」結構的語法語義功能，並且對該結構中「之」的語法結構與功能作分析。

「VP 之 NP」結構中「NP」與「VP」之間的語義聯繫不外乎以下幾種情況：結構話題(NP)是 VP 的必有論元成分，是 VP 的非必有論元成分；是 VP 論元成分的廣義「領屬」者；VP 論元的語義配價成分，與述題中的某個 NP 產生複指或「複說」關係；與述題部分沒有語義聯繫，但存在認知上的關聯。根據我們對《史記》中語料的考察，「VP 之 NP」結構中主體論元「VP」與結構話題「NP」之間的語義結構關係大致可歸納：1. NP 是 VP 的邏輯施事論元；2. NP 是 VP 的受事論元；3. NP 是 VP 的憑藉或工具；4. NP 是 VP 的廣義領屬論元；5. VP 是 NP 的某種特異功能或性質。

### （二）現場討論：

1. 本論文之行文條理十分清楚，例句羅列亦十分完整，是一篇論述詳盡的好文章。
2. P182 言「VP 之 NP」句法到漢魏六朝時期逐漸消失，然我們知道在六朝以後仍有此種句型，如『初生之犢不畏虎』，『敗軍之將不可言勇』現今我們都還在用。因此，不知本文的這種說法其依據為何？為何能得到這個答案？
3. P182. 『我們在對《史記》中的漢語語料進行考察時……這也是《史記》中較為顯著的語法特點。』不知作者得出的這個答案是參考哪些書籍，比較的謂語有哪些？比較時所採取的材

料及標準有哪些限制？

- 4.VP 之 NP 的語法隨處可見，作者又如何斷定這種語法是《史記》語法中最顯注的特點？
- 5.文中提及「VP 之 NP」的某種『特異功能』或性質」。有關『特異功能』、『技術人們』、『熟練上』等一些句法修辭是否可以更普遍明確？
- 6.本文作者回答由於寫作本文時時間有些倉促，因此，有許多疏漏及不盡周延詳盡之處，尚待改進，關於這些指正，在會後將會虛心檢討與修正，以期達到正確完善。至於海峽兩岸對於常用語彙的一些差異，也將一併作修正，謝謝。

### (三)、心得感想：

這是一篇談論語法結構問題的專門性文章，由於作者在口頭發表時講話速度極快，加上筆者對於語法的認識有限，又沒有強烈興趣，因此對本論文的瞭解有限。從論文形式來看，本文只明確寫出二個章節名稱，而在第一章節前有一個大段落，似乎就是前言；第二章節後也有一個大段落，似乎就是結語，但論文中並未標明。在這次的學術研討會中，筆者發現一個現象，來自大陸的學者在論文格式上似乎都犯了不夠完整的毛病，這或許是兩岸對論文格式要求的標準不一所致吧！此外，本文的引證例句大抵皆以《史記》為主，那麼在論文之副標題上是否修改成「以《史記》中虛詞『之』的句法為例」會更貼切呢？

論文三：兩漢時代的文字東傳

論文發表人：高倉洋彰先生（日本）

特約討論人：方環海先生先生

#### (一)、論文摘要：

倭人理解漢字主要是根據石器時代使用漢字的考古資料。

- 一、日本列島在西元第四、第五世紀時對漢文字的理解：倭人使用漢字的時期可能比以往的論斷年代再往前，推論很可能在第四個世紀時即開始使用漢字。
- 二、倭人墨書、刻書的土器：倭人墨書、刻書的土器最古的資料上溯到公元第三世紀左右。有出現出『竟』、『大』等各種漢字，也有用筆墨所寫成的文字。此外，有更早的出土資料中有類似如『田』、『奉』、『幸』、『年』、『與』等墨書文字，這是目前日本現存最早的墨書文字。若確定是為漢字的話，則倭人使用漢字的年代更往前推論到第二世紀，也就是漢字進入日本年代將追溯到第二世紀。
- 三、倭人有認識漢字的必要性：最主要理由是中國有文書外交的工作，在公元三世紀時倭人和中國的魏朝來往，魏朝賜倭王『親魏倭王』金印，並賜給其布帛、五尺刀、銅鏡等各種賜品，倭人使臣到中國將這些賜品列為帳冊，然後先行返國，隔年中國將賜品送達倭人後，倭人國王必須上表謝恩。由此可見，在二國外交及文書來往的交通下，倭人有認識漢字的必要性。
- 四、倭人與漢字的交會：第二世紀文字資料出土及倭人魏志文書記載的出土，可以推測倭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應為廣泛的認識漢字年代。其中所出土的竹管筆及削刀都可能是書寫漢字的工具，乃配合當時實際書寫的必要。西元前一世紀後半以來韓國半島及日本列

島急速增加的漢字品的資料出土，可以證明韓國及日本的倭人渴望與漢王朝交流的史實，而漢字是與漢王朝交流的重要工具與憑藉，因此，漢字在此時有其傳入倭人的可能。由此可知，倭人與漢字的交流，也很有可能往上追溯到西元前一世紀後半的西漢時代。

## (二)、現場討論：

### 1. 一個總評：

漢字東傳日、韓本是一項十分具有爭議且熱門的議題。高倉先生提出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中國與東岸（日、韓）已有交流，文字也可能東傳，駁斥了漢字在公元後四、五世紀才傳入日本的說法，引用最新出土資料和考古學成果證明，令人激賞，也證明了中國文化在秦漢時代即開始向周邊國家造成的廣泛影響。

### 2. 二點印象：

(1) 論題十分有價值，漢字在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中及東傳上具有十分關鍵性的作用，是古文化的標本，亦即胡適先生所說的：『一個漢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2) 本文不僅以作者自己的認識作為行文觀點，還引證了許多出土文獻，用地下挖出來的資料，『以死證活』、『以古證今』的方法是十分具有科學精神。

### 3. 三個問題：

(1) 文化影響在擴散上應該具有普遍性，應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材料，但在本文中所選用的材料似乎略顯單薄，只著重在出土文物中的文字及書寫工具，能否補充其他材料來證明使其結論更具說服力。

(2) 漢字文化的形成與其人口遷移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兩漢時代文字東傳是否也具有人口遷移的一些證據？是否也能在文章中多加引證？

(3) 本文論述許多出土『筆』的資料，但其中有些出土文物除了類似『筆』的功能外，似乎也可能是其他功能的用具。如此說來，作者所認定的『筆』是否是真正用於書寫用的筆？可否再詳列具體詳盡的證據？而『筆』的存在和漢字東傳是否有其必然性，應該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論題，可惜本文並沒有處理它。

## (三)、心得感想：

日本的高倉洋彰先生用日文發表這篇論文，透過連清吉先生的翻譯，讓筆者大略瞭解到其論文內容的十之七八。根據論文內容，高倉先生將漢字東傳的年代往前推至公元前一世紀，且在文中利用一些出土文物作佐證，然而筆者以為孤證難立，論文中所提到要來證明高倉先生說法的證據實在是略嫌單薄。不過，對其所提出來的這種大膽推測，筆者則十分佩服。至於高倉先生這樣的說法是否能夠成立，則有待日後更多出土文物及典籍來印證了。